

# 缅怀历史教授杜士铎

——为杜士铎叔叔逝世十五周年而作

□ 杜登科

我本家至亲叔叔杜士铎，字福海，1925年1月23日出生于尧都区晋掌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亲系本村杜氏家族第17代孙杜俊杰，毕业于一所农业中等专业学校，是个小知识分子，在叔叔出生前英年早逝；母亲是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叔叔8岁时不幸病故。母亲病故之后，叔叔与年长5岁的哥哥杜剑秋（小名海子）、嫂嫂马仲玲相依为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当年叔叔家以务农为主，拥有土地10余亩，房屋10余间，耕畜农具基本齐全，生活可过。缘于父母相继去世，生活极度困难，兄弟俩便在族人的主持下，变卖部分土地，至解放时，叔叔家仅剩6亩多地，房屋8间。

叔叔于1933年起在晋掌村小学读书，因母亲病故，曾一度辍学。1936年他遵其兄之命，重返小学读书。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刚从小学毕业的叔叔与其兄嫂马仲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重返家园后的1939年，包括临汾在内的山西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沦陷区的城乡，满目疮痍，一片凄凉，沦陷区的人民在日军铁蹄践踏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面对此情此景，曾受中国工农红军熏陶和影响的少年叔叔，立志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期拯救处在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于是，叔叔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秋，到临汾县立第一

民族革命高级小学读书。在该校毕业后，1941年10月，叔叔又到先后设立在乡宁、隰县和祁县的山西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直到1947年7月高中毕业。读书期间叔叔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积极参加军事训练，而且满腔热情地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多种抗日宣传活动。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叔叔准备以自己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重建大干一番事业，然而蒋阎之流，悍然发动内战，将祖国和人民拖入内战的深渊，这使年轻的叔叔陷入极度悲观失望之中。1947年7月，叔叔从一联中毕业了。在毕业即失业的1947年9月，因生计所迫，叔叔被迫通过熟人介绍，来到伪山西省寿阳县政府秘书室，从



杜士铎工作照



1949年2月,杜士铎(上排左二)与同学的合影照事“管理公文旧案,收发公文”的工作,直到1948年4月。尽管这段经历仅仅半年,但叔叔仍然深感内疚,并多次反省检讨。在伪寿阳县政府任职期间,叔叔对该县官场贪污受贿、相互倾轧、阿谀奉承、欺压百姓等种种恶习,深恶痛绝。他在职不久,便暗中找机会,另谋出路。他边工作,边加紧复习功课,于1948年9月,顺利考入山西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成为旧中国山西大学的一名末代大学生,他亦是晋掌村最早考入山西大学的第一名大学生。

叔叔在大学读书之初,正处在蒋阎反动统治行将崩溃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即将建立的时期。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叔叔坚定地站在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正因为如此,当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此前已随校迁至北平的叔叔和他的同学们积极参加北平市民的游行队伍,欢呼北平和平解放。后来,又随校迁回太原的叔叔,对党在建国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等,都坚决拥护和支持。1952年6月,叔叔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成为晋掌村杜氏家族历史上第一名大学教师。这时出身

于农民家庭的叔叔兴奋不已,并由此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产生无限感激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目睹新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对祖国的前途充满无限希望。在踏上工作岗位后,叔叔更加自觉地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不断改造提升自己,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基本知识,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愿望。文化大革命之后,叔叔大有一度迷茫而重见光明之感,他重新焕发了青春和活力。正因为通过这个时期的理论学习和体验,他的思想水平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1988年,叔叔被历史地推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位置,直到1991年12月退休。他在当年撰写的一份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过去战争年代,我没有为党的伟大事业流过血,出过汗,现在虽已年迈花甲,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四化建设,为共产主义大厦的建成添砖加瓦。我将以我有生之年,为党的任务和目标的实现而奋斗到底。”叔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虽年逾花甲,却干劲十足,率领全系教师从事教学和研究等工作,并在短时间内,使历史系的面貌发生可喜变化,从而受到全系教职员工的认可和称赞。

在山大执教的40年间,叔叔始终把主要精力和心血投入历史教学之中。主要表现:一是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从事作为基础课的中国古代历史教学。他不仅给系内外本、专科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为学生批改作业和进行课外辅导,还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些许专题课程;二是精心备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叔叔在教学工作中,特别重视备课这个环节。他在每次讲课之前,都要认真钻研教材,查阅资料,以此为基础编写讲稿。他在给下一班学生讲课时,还要对上一

年的讲稿进行充实和提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经常在课后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有时旁听其他老师的课堂讲授,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此,叔叔早在 1957 年写的一份自传材料中就曾写道:“在备课方面,我的讲稿每年都要进行修改,吸收最近的科学成就,一些历史图表,往往是事先画在稿纸或教师的黑板上,以加强同学的感染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还有意识地听过一年《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由于他备课认真,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故其教学效果备受肯定。

叔叔在从事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亦很重视学术研究工作,他经常就中国古代史方面的重要课题,特别是与其有关的一些疑难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精心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指导等等。他的科研成果丰硕,影响较大有主编出版 48 万



字的《北魏史》和 38 万字的《中国古代历史备览》《张壁为北魏孝文帝时宁州寄治考》及独著出版的《伟大的探险家——张骞》,主持编制出版的《中国历史大系年表》。另外,他应出版社之邀曾帮助修订《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书稿,他被誉为魏晋南北朝史名家。

叔叔在任教期间做了大量的教学管理和社会工作。他除长期兼任历史系中国古代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主任之外,曾兼任山西省历史教学法研究会理事长、山西省历史学会理事、山西省孔子学术研究会常务理事、民盟山西大学总支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山西省委第四、五届常务委员、民盟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中央第五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等多个职务,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重要贡献。

2004 年叔叔逝世之后,有关方面在印发的《杜士铎同志生平》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杜士铎同志不仅学识渊博,工作成绩突出,且品德高尚。”其评价言简意赅,名副其实,恰如其分,若九泉之下的叔叔感知亦会十分欣慰。



(作者系本刊特邀编辑)